

第一章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冲突与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价值冲突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在民族国家受到经济全球化猛烈冲击的情况下，价值成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之也引起各民族国家的重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既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政治过程。经济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过程，它在分裂的同时也在推动着整合，在产生合作的同时也在引发着冲突，在实现普世化的同时也在形成特殊化。对这种矛盾与冲突作出一种理性的分析，准确概括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冲突的表现形式，无疑有助于探寻价值冲突的选择机制。

第一节 价值及其特征与功能

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冲突，涉及到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何谓价值及其价值的特征与功能，只有明确了价值的内涵、特征与功能，才能为我们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冲突提供基础。

一、价值的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价值是指“商品中凝结的一般人类劳动”，据此不同的商品得以交换。在科学研究的方法讨论中，人们常常将“价值”与“事实”、“价值研究”和“实证研究”相对应。在这一语境中，价值相当于人作为主体的主观性或者价值取向，包括人的主观好恶、希冀、理想及其追求等等。有人甚至认为，只有实证研究才是“研究”，而“价值研究”只是发表个人的“意见”。在日常生活中，价值的重要内涵是功用，相当于经济学中的“使用价值”。当人们说某事物或某做法没有价值时，实际上指的是该事物失去或没有功用。

在我国理论界，价值界定的模式大体有四种——“实体说”“属性说”“关系说”和“意义说”。“实体说”的基本意思是将价值等同于价值物本身。所谓“属性说”，是认为价值事物的某种属性，最主要的是事物的“有用性”。这两种定义的优点是较为感性直观，也反映了价值概念的客观性。但是这两个界定的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一是界定本身无法真实地解释价值存在的实质；二是它在反映价值客观性的同时却无法面对价值的主观性与超越性。

“关系说”则是以人的主体需要为纽带说明价值的一种价值界定方式。它将价值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说明，应当说已经避免了“实体说”、“属性说”的片面性。但是有两个主要的理由说明“关系说”的局限性：第一，“关系说”“远离人们的日常经验，把最现实的价值抽象化了”。虽然价值无法脱离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但在经验中，我们却又很难将价值仅仅看做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范畴。就是说，即使某一主体与客体的直接联系不存在，该事物的客观“价值”仍然存在。第二，从逻辑上说，“关系说”也是不周延的。“关系说在说

明一种手段价值时显得游刃有余，而在说明一种目的价值时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主要是因为“关系说”对价值的说明，基本建立在主体需要的基础上——而需要又往往被理解为人基本需要。比如一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甚至丧失了生活能力的人有无存在的价值？着眼于人类需要的关系说就很难作正面或直接的肯定性解释。

此外，实际上价值的存在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价值的静态存在。如前所述，即使某一个体的主观需要与客观事物没有现实的联系，该事物的客观价值仍然存在。另一种是价值的动态存在，即主体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等等。“关系说”不能较好地说明前者，更不能很好地说明后者，就是说“关系说”不能很好地说明价值的动态存在。

“意义说”认为：价值就是事物向主体呈现的意义。我们认为，较好地界定了价值范畴的只能是价值界定上的“意义说”。

首先，“意义说”是一种扬弃了前三种界定的界定。在“意义说”中，一个事物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作为主体的个体是否直接感受到或者承认事物的某种意义，这一事物的意义都是可以客观存在的。所以它继承了“实体说”和“属性说”的优点。同时“意义”本身又提醒我们，它只有在主客体关系中才可以存在。一个事物的意义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我们能否发现意义，我们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发现和评价一处事物的意义，又完全取决于价值主体。所以它吸收了“关系说”对“实体说”和“属性说”的纯客观性界定的批判。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意义说”能够在较为充分地说明手段价值时，也能够较好地凸现目的价值的存在；在肯定价值客观性的同时，又充分地揭示、肯定价值所富有的主观性或主体色彩——“相关性、意义、应该、理想、目的、感情意识、前景、意向、追求、绝对命令、人的自由、未来”等等。没有动态的价值，就没有静态的价值。没有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整个价

值系统就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就不能成其为价值。“意义说”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既有较好地解释静态的价值存在，又能较为充分地体现主体的价值追求。人们的价值追求就是对意义的求索，也才能够充分地解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存在、价值冲突和价值选择。

二、价值的特征

1. 价值的客观性与主体性。价值既有客观性，也有主体性。但价值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这是价值哲学中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争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在价值哲学领域的表现。大家知道，西方有一些学者认为价值是主观的。认为“事实标志客观性，而价值表示主观性”。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认为价值不是对象的特性，这是对的，但他完全否认对象特性对价值的作用，认为价值是相对于估价的心灵而言的，这就完全把价值看成主观的东西，从而否定了价值的客观性。逻辑实证主义者罗京、艾耶尔又认为，价值仅仅是情感的表达，是不可证实的，把价值看成纯主观的东西，完全否定了价值的客观性，因而这都是唯心主义的价值理论。

我国的学术界一般都肯定价值的客观性，它的基本含义有三种：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性，即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外部存在，指物质存在；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客观性，指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东西，包括主体意识之外的社会和精神现象；三是主客体对象性关系意义上的客观性，是在价值认识、价值评价主体之外实际存在并不以它们的意志为转移，价值客体、价值主体、价值中介、价值活动等都是价值客观性的基本根据。

价值具有客观性，同时具有主体性。所谓价值主体性，就是客体价值的有无与大小要受主体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价值主体性主要表现为自主性，指在主客体价值关系中，价值客体的属

性和功能是产生价值的前提，是价值产生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方面。但是客体的属性与功能对主体的价值有无和大小，取决于是否符合主体利益，取决于其效应是否对主体有益及益处大小。同时在价值关系中，主体居于主动、主导的地位，对价值客体起主宰、主导、支配、控制作用。价值主体性又表现为超越性，主要指主体性的重要表现是能动性，能动性就是发挥主体的本质力量去克服困难、不足和使现存事物得到发展。这种超越性表现为优越性、创造性、理想性。

2. 价值的社会性与历史性。价值具有社会性与历史性，二者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所谓价值的社会性，就是价值受社会影响制约、打下社会烙印的性质，具体说就是价值受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和制约的性质。价值的社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价值关系具有社会性，价值关系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关系。从价值主体来看，价值主体是人，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离开了社会就无所谓人，也无所谓主体，主体可分为个体主体、群体主体、社会主体。其次，价值活动具有社会性，价值活动是价值主体主动进行的认识、评价、创造、实现价值的活动。价值主体是社会的人，单个的主体不能离开社会和其他人而进行价值活动，他直接和间接都要依赖于社会。最后，价值内容具有社会性。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主体是社会的人，这种效应是一种社会效应，因而价值归根到底是社会价值。

价值的社会性决定它的历史性，社会发展的历程就是历史，价值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因而具有历史性。价值的历史性，首先表现在价值主体的历史性，价值主体是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利益、需要、知识、能力、情感、意志都随着发展，随着主体因素的发展，价值也不断发展。价值的历史性，还表现在价值客体随历史发展而发展变化，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文化的交流，各种条件的改变，价值

客体也不断发展、变化，新的客体不断涌现，旧的客体不断被淘汰。价值的历史性，还表现在客体的价值随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由于主体本质力量的增强，过去无用的东西，今天有用了；过去用处不大的东西，今天用处很大；过去是废品，今天是宝贝。可见同一客体，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价值。

3. 价值的相对性与绝对性。价值具有相对性，也具有绝对性，是相对与绝对的统一。价值是一定客体的属性与功能作用于一定主体产生的效应，是相对于一定主体而言的，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发展的，因而是相对的，具有相对性。价值的相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价值是相对于一定主体而言的，同一客体对不同主体的价值不同，主体分为不同层次，同一客体对不同层次的主体，价值不同；同一客体对同一层次的不同主体，价值也不同。其次，价值是相对于一定具体条件下的主体而言的。同一客体对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下的主体，价值不同。再次，价值是相对于一定的客体和客体的一定属性而言的，客体的不同属性或不同客体对同一主体的价值不同，不同的客体对同一主体的价值不同，就是同一客体的不同属性对主体的价值也不同。最后，价值是相对于一定的环境而言的。马克思说：“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那么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① 所以价值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环境中，一定客体对一定主体的价值。

价值的绝对性就是价值作为客体对主体的效应存在着普遍性、无条件性、恒常性、客观性。普遍性是指，只要有人类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7页。

在，有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有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有价值存在。现实存在的价值不论价值如何不同，它们都是价值，这一点是共同的。确定性是指，同一客体在一定条件一定环境下，对同一主体有无价值和价值大小则是确定的。恒常性是指，人作为人有其共性，古代的人、今天的人和将来的人是不同的，但又是前后相继的。今天的人是古代的人的继续，将来的人是今天的人的继续。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历史的发展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不论历史怎样发展、进步，人还是人。同一时代的人类有其共性，不同历史时代的人类其差别很大，但也有共性，正如不同阶级的人之间有共性一样。因此，对不同历史时代的人类来说，价值具有恒常性，比如劳动的价值、科学技术的价值、教育的价值、优秀文化的价值等。

4. 价值的多元性与一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一元性是价值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表现，同时价值多元性与一元性又有自身的特有内涵和某些特点。价值的多元性，是指同一客体对不同主体或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同一主体的价值不同，甚至有多种价值。主要表现是同一客体对不同主体，价值不同；同一客体对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主体价值不同；同一客体对同一主体的不同方面价值不同。价值具有多元性，又具有一元性，它是指价值的确定性、单一性，是客体对同一时期的社会主体或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的具体主体，对某一主体的某一方面的具体的价值是确定的、单一的，而不是多元的。主要表现在：同一客体对同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体的价值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同一客体对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的某一主体或主体某一方面的价值是确定的、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

三、价值的功能

1. 自觉功能。价值的重要功能是可以增强自我意识，提高

主体的自觉性。主体的活动是自觉有目的活动，目的是主体根据需要与客体条件而确立的价值目标，它的确立是主体自觉的标志，明确的价值追求，是主体自觉性的表现。价值活动受到挫折，则使主体反观自身，使主体具有更清醒的自我意识，从而提高自觉性。价值追求越高，价值活动越艰巨，担子越重，挫折、失误越多，主体的缺陷暴露越多，对自我认识越全面，自我意识越清醒，越具有自觉性。

2. 动力功能。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价值的实现，价值的追求是主体活动的动力。主体活动发端于主体生存、发展的需要。主体进行物质和精神活动，创造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其目的是为了为了满足主体需要，获取更大价值。主体的需要是基于对主体生存发展完善的客体条件的依赖与匮乏，这就产生紧迫感、迫切感，从而迫使主体努力去获取某些客体方面满足主体需要，促进主体生存、发展、完善，即创造价值。因此，价值是主体利益的表现，价值追求，使主体产生高涨的热情与难以平静的激情，激发起全部力量，振奋起主体的意志，成为主体活动的巨大动力。

3. 规范功能。价值本身内含着规范。所谓规范，就是行为的规则、准则、尺度、标准。它规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规范有科学、道德、审美、法律规范等等。规范判断以价值判断为基础，它所表达的是主体“应当”如何，包含着对客体价值的肯定；主体“不应当”如何，则包含着对客体价值的否定。价值决定规范，一般价值判断决定规范判断，价值观决定伦理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伦理观，就有什么样的行为规范。价值追求包括着价值理想，它有动员、指导和规范作用，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服从一定的价值理想，用价值理想指导行为、约束行为，就有一定的规范作用，所以，规范功能是价值的重要功能。

4. 调节功能。价值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有价值的东西主

体就肯定、强化、坚持，无价值的东西或有负价值的东西主体就否定、抑制它。价值的调节功能就是根据客体价值而调整自身行为和部署，节制、约束自己的某些行动，强化某些方面的活动，以减少损失，求得更大价值的功能。

5. 发展功能。价值的最重要的功能，是能促进主体本质力量的发展，使主体发展完善。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这种效应是对主体生存、发展、完善的效应。具体说，是使主体获得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使主体生活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使主体体质、智力、品德都得到发展，从而增强主体的本质力量。从价值创造的过程说，这个过程是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主体客体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客体主体化，使主体受到改造，使主体适应客体规律，改造自己不适应客体的东西，使主体本质力量逐步增强的过程。从价值实现过程来说，客体被主体消费、欣赏、阅读，变成主体机体的组成部分，提高主体智力、审美能力，陶冶主体情操，这这也是一个增强主体本质力量的过程。

6. 创新功能。价值是超越，超越来源于创造，价值激励着主体创造。创造、创新是价值的重要功能。价值客体有一些是自然客体，但绝大多数都是主体对自然客体进行加工改造而获得的劳动产品。自然物在其自然形态上往往只具有潜在价值，未经主体加工改造开发，不能变为现实价值。为了满足主体生存、发展的需要，主体就必须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客体，创造出满足主体需要的产品。主体的实践活动是创造价值的活动，即创造新的价值客体的活动。每一次实践活动的结果都生产出新的价值客体。实践改造和锻炼了主体，增强了主体本质力量，提高了主体的创造力，促进了主体在新的实践中创造出新的具有更高功能的价值客体。随着实践的发展，主体智力逐步提高，精神世界更加丰富，精神生产能力逐步增强，生产的精神产品更多。随着主体的价值活动的发展，价值客体增多、财富增多，价值客体更加多样化，使千姿百态的价值世界更加绚丽多彩。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冲突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进程，实际上又是蕴涵着价值冲突的历史过程，它是一把双刃剑，又给人们带来了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一、经济全球化的价值界定

经济全球化概念的提出起源于经合组织（OECD）前首席经济学家 S. 奥斯特雷，主要是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动，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过程。随着对全球化问题研究的深入，人们正在从不同的视角给出全球化的定义。以下是目前几种比较流行的定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全球化下的定义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亦即世界范围内各国成长中的经济通过正在增长中的大量与多样的商品劳务的广泛输出，国际资金的流动，技术被更快捷地传播，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的现象。”^①

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卡尔·海因茨·巴奎认为：“当谈论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的时候，具体指的究竟是什么？在这里一开始就遇到困难，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肯花力气对这个捉摸不定的时髦词汇作出界定，或者至少对它的意义作出合理的限定。……最贴切的概念理解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的。根据这种见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跨越国界的贸易额在世界生产

^① 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7 年版。

中所占比例越高，世界经济就越强烈地全球化。’^①

1995 年出版的英国《科林斯商务词典》将国际化和全球化等同看待：“国际化或全球化是指公司通过出口向国外经济进行扩张，但尤其专指通过对外国的投资，建立生产部件的工厂、制造车间和销售子公司。”

法国学者雅克·阿达则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世界的支配和控制。在他看来，苏东集团解体以后，资本主义横行的主要障碍已经不复存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债务国在债务危机的压力下，正在按照国际金融机构的意志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而国际金融机构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讲，都充当着资本主义的“代言人”，是推行全球资本主义的工具。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也就是资本主义肆虐全球的过程。

从以上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意义界定中可知，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现象，有的学者指出：“全球化是一个价值范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各种价值观的碰撞与冲突变得愈来愈频繁。目前人们围绕着经济全球化问题展开的争论反映了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全球化话语背后呈现不同的利益诉求，“全球化把我们推进激烈的价值冲突中”^②。与以往社会相比，全球化时代的确使人们在价值观上面临新问题，“当代的人们遭遇的‘他者’从根本上的挑战。他们知道，世界上种种不同的规范与价值引导人们的行为和态度，因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而不同。因此对许多人来说，发现‘他者’的存在使得他们认为价

① (德)卡尔·海因茨·巴奎：《世界经济结构变化与后果》，载《政治与现代史》1995年第49期；转引自张世鹏：《关于全球化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第3期。

② (德)马蒂亚斯·霍尔茨：《未来宣言：我们如何为二十一世纪准备》，王滨滨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值是完全相对的。^①今天，随着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价值观念的变化正在加速，全球的价值冲突与交融、对抗与对话成为当下一道令人炫目的图景。当代全球化态势下的价值关系，是以主体间的价值关系为核心、以主体的价值观为主导、由多重性价值关系所组成的系统结构，在这种系统结构中，既有价值的协调与交融，又有价值的矛盾与冲突。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系统的角度，从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关系方面，来探讨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冲突与选择问题。

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全球化具有二重性：它是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也是进步性和破坏性的统一。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的全球化新趋势的影响，具有下面三大影响：

一是时空压缩，引起价值激变，人类交往从强度、速度、广度和深度四个维度上展开。吉登斯就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国际分工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四个向度来分析全球化。这种情况使人们几乎来不及判断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就匆匆被裹挟进全球化浪潮的洪流之中。

二是风险代替危险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主要特征，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20 世纪 90 年代，当一些西方的理论家们为“共产主义的终结”而欢欣鼓舞时，认为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敌人的社会”，殊不知，这个社会是“不知敌人在哪里”的社会，“风险”代替了“危险”成为我们时代的突出特征。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一书中概括了这样一幅现代性的“风险图景”^①：①高强度意义上风险的全球化，如核战争构成的对人类生存威胁；②突发事件不断增长意义上的风险的全球化；③来自人类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的风险，人类的知识进入物质环境；④分布趋势均

^①（法）魏明德：《全球化与中国——一位法国学者谈当代文化交流》，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35 页。

匀的风险意识；等等。^①

三是全球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和即成的制度或意识形态。不可否认，全球化主要还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形势，国际资本主义在进行资本输出、推行全球化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推行它们的政治战略，经济扩张与思想渗透的统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仍将面临主权凝聚的两难困境。

全球化在带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机遇的同时却是一个不断出现冲突和矛盾的进程，“就性质而言，全球化是一个具有内在矛盾性的统一体。全球化不是单一化、同质化，而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单一化与多样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碎裂化、集中化与分散化的统一。”全球化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充满着弱肉强食式的激烈竞争。“全球化伴随着更多的贫困、失业和社会分裂，而这些贫困、失业和社会分裂却恰恰存在于孤立、边缘化的暴力行为中。许多人尤其是易受伤害的人，对未来——自己和他们孩子的未来——的危机感正在加剧”^②。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事实上，西方社会也出现了“第三世界化”，即内部的两极分化和部分人群的边缘化。可以说，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即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和风险同在：

第一，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并存。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是以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作为动力的，而西方社会不同群体对它的适应能力大相径庭。在全球化进程中，对利益的分配差别极大，不断产生着新的社会不公正和新贫困。西方传统产业工人、低技能劳动者以及失业者处于被全球化排斥的地位。除此之

^①（英）安东尼·吉登斯著：《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32 页。

^②（美）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著：《全球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8 页。

外，有一部分全球化反对者“并不是真正缺吃少穿的贫困者……目前社会中间阶层中广泛流行的对即将丧失社会地位的恐惧会爆发出无法预料的政治爆炸力。不是贫困，而是对贫困的恐惧正在威胁着民主。”^①他们对全球化带来的剧烈社会变革感到焦虑不安，担心会失去自己的既有利益。经济全球化为资本提供了选择世界产业后备军的机会，“工人如今发现自己处在更容易被外国工人替换掉的环境之中。对于那些缺乏技能而较容易被替换的工人来说，结果将是处于更不安全和更危险的状态之下。”^②世界竞争还不仅限于低技能工人，甚至波及处于信息网络社会的所有劳动者。从总体上看，反全球化声音主要发自受到全球化冲击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

反全球化其实是资本全球扩张导致的矛盾的展开，参与者不仅强烈不满全球化的经济不公平，而且强烈反对其生态、文化和社会效应。他们是工会活动者、环境保护主义者、反对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农产品保护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反对新经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左翼政党。这些左翼政党提出了“以反全球化反对资本主义、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口号，为组织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进行积极准备。发达国家的部分阶层已经成为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这说明发达国家全球化的受益面是不均等的，有的遇到冲击，有的得到机会。对于弱者来说，全球化时代是不安全的时代。据统计，从 1979 年至 1999 年，美国 5% 收入最高的家庭的平均收入与 20% 收入最低的家庭的平均收入之间的差距，从约 10 倍扩大到了 19 倍。1999 年美国有 10% 的家庭“没有食物保障”。美国劳工部 2001

① (德) 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著：《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 页。

② (美) 丹尼·罗德瑞克著：《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熊贤良、何蓉译，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1 页。

年底宣布，美国靠救济生活的人总数已达到 402 万人，创 19 年来的最高。美国中产阶级在 90 年代经济繁荣时期并没有比上一个 10 年更富裕。现在，1% 最富有的美国人拥有全国财产的 40%，而 80% 的美国人只拥有 16% 的财产^①。

第二，“中心”与“外围”矛盾的深化。经济全球化使得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的扩张促进了世界财富的增长，现代科技的扩散效应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为世界各国交往提供了便利。但是，经济全球化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也在逐渐暴露出来。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南北差距、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出现了而且还在不断出现一批边缘化的国家和人群。发达国家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重组早已占领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高点，而发展中国家大多尚处在工业化阶段，还有一些穷国仍然停滞在农业社会，它们在全球化的信息化潮流中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全球化在制造发达的同时也在制造不发达，特别是南北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无论是世界的还是国家的，在过去造成了不发达，而今仍在造成不发达。”^② 1960 年，世界上最富的 1/5 人群与最穷的 1/5 人群的收入比是 30:1，1990 年这个比例扩大为 60:1，1997 年更达到了 74:1。1999 年，美国的人均 GDP（30600 美元）是最穷的埃塞俄比亚人均 GDP（100 美元）的 300 多倍，前者一天的收入差不多等于后者一年的所得。经济上的不平衡必将导致政治上的冲突，地区冲突、难民流动、社会动荡、环境退化甚至酝酿着极端民族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

^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1 年美国人权纪录》，载《光明日报》2002 年 3 月 12 日。

^②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15 页。

构成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威胁。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心与外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心国家拥有雄厚的资本和科技实力，它们一方面大力投资于从事创新活动的研究与开发，另一方面广纳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牢牢控制着科技创新的领先权，控制着全球分工的新优势。除了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被排除在分享世界高新技术的好处之外。全球化规则明显有利于强者，发达国家垄断了核心技术，是技术标准的制定者，高新技术可以通过申请国外专利“赢者通吃”，南北之间的“数字鸿沟”甚至比它们在经济总量的差距还要大，全球 1/5 的富人的因特网用户占了世界总数的 93%（比他们占全球 GDP 的 86% 还要高 7 个百分点），而收入最低的 1/5 的穷人因特网用户仅占区区 0.2%，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边是信息高速公路，一边是信息荒漠。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也发生了分化：一些国家提升了自己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如印度成为世界软件开发大国），另一些国家接过了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接力棒，还有一批国家“在国际政治体系和不平等贸易的共同作用下，不仅成为附属国、原料储备国，而且完全如同帝国主义‘经典’时期一样：对于处于世界垄断中心地位的国家来说，这些国家实际上已经不再有任何经济或战略（冷战结束）意义。它们纯粹是包袱，是 20 世纪末‘世界体系的死角’”^①。

第三，“一球两制”共存与竞争。毫无疑问，全球化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优化配置，推动了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当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的网络时，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愈发具有了世界性质。资本主义不断寻求克服它内在的限制，但它又往往在更大规模上再生产这种限制，经济全球化正在加速这一过程。资本主义“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值，肆无

①（法）F. 沙奈：《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 页。

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①。资本通过全球化的推动，创造出了世界各地的全面交往和全方位的相互依赖，并不断创造出注定要替代它的新社会因素。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资本扩张的过程，资本积累的逻辑必然导致财富积累于一类国家，而贫困则积累于另一类国家，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因此而得到充分的展现，在更大的范围产生联动效应。一个在生产力上强大的社会，在对待人类价值的态度上可能是卑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变得不能忍受，就是因为它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创造出贫困的大众和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并作为异己力量的巨大财富。“在以往大部分时间里，不平等现象都能为人们容忍，因为各大陆之间远隔重洋，文化相去甚远。而今世界各地之间距离缩短，交往密切，人们在政治上普遍觉醒，不平等现象就变得难以容忍。”^②

近年来，反全球化浪潮促使人们深刻反思全球化的另一面，这种要求公平的愿望与自由、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理念相一致，“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极右翼、种族主义相比，社会主义代表着理性、进步的价值以及伟大革命的时代。”^③社会主义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范式，这种价值范式提倡平等和民主，反对不公平与压迫，旨在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20 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苏联、东欧国家是一种扭曲的社会主义，它们的改弦易辙只能说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49 页。

②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5 页

③ 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7 页